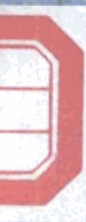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

◆ 董孟雄 郭亚非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



◆ 董孟雄 郭亚非 著

本书受云南省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责任编辑：王建南 吴虹

封面设计：袁亚雄

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

董孟雄 郭亚非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6.375

字数：350 000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22-02217-1/F·263 定价：22.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云南地区的对外交往历史基础.....	(1)
一、充当古代朝贡通道的云南地区与周边国家的 关系.....	(2)
二、“南丝绸之路”和古代的民间交往	(6)
三、元明清三代云南地区对外经济交往的增进	(11)
第二节 英、法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云南开埠通商	(19)
一、英帝国主义蓄谋由云南连通印缅至长江流域 的商路	(19)
二、法帝国主义蓄谋连通印支与云南的陆路商道	(28)
第三节 蒙自、思茅、腾越口岸的形成及比较	(37)
一、蒙自口岸的形成	(38)
二、思茅口岸的形成	(42)
三、腾越口岸的形成	(44)
四、各口岸对外贸易状况和地位的比较	(46)
第四节 云南地区近代对外贸易的分期与特点	(57)
一、总况及分期	(57)

二、云南地区近代对外贸易的特点 (60)

第二章 自由贸易初期 (1889 年~1911 年)
..... (71)

第一节 本阶段的云南对外贸易状况 (72)

- 一、本阶段的贸易总况 (72)
- 二、对外贸易经营环节由华商掌握 (75)
- 三、较为单一的传统性的出口商品结构 (79)
- 四、洋行插手进口经营及进口商品的全消费性 ... (84)
- 五、外贸结算及平衡手段 (91)
- 六、商道和运输工具 (99)

第二节 云南地区传统经济的开始松动..... (108)

- 一、出口贸易引起矿藏资源的开发和采冶业的畸形发展..... (108)
- 二、资力较厚的外贸商业资本的出现和转化不足
..... (114)
- 三、市集的变化和通商口岸、运输沿线与各地商品经济的不同程度发展..... (125)
- 四、新经济成份的增生和新产业部门的出现..... (136)

第三章 自由贸易初步发展时期
(1912 年~1931 年) (159)

第一节 本阶段的云南地区对外贸易状况..... (159)

一、本阶段的贸易总况·····	(159)
二、帝国主义控制我省进出口贸易的企图·····	(170)
三、进口贸易的发展及特点·····	(185)
四、出口贸易状况·····	(192)
五、滇越铁路、个碧石铁路通车后的云南外贸 运输·····	(196)
六、法、英金融势力操纵对云南外贸的影响·····	(206)
第二节 本阶段对外贸易对近代云南社会经济的 影响·····	(216)
一、自然资源的开发·····	(216)
二、省内新经济因素的滋长·····	(230)
三、商业资本向经营产业的转化·····	(238)
四、市场结构开始向近代转化·····	(245)

第四章 自由贸易迅猛发展时期 (1932年~1936年) ····· (266)

第一节 本阶段云南地区对外贸易状况·····	(266)
一、贸易额保持发展·····	(267)
二、土货转口输入额日显优势·····	(272)
三、贸易对象的国家和地区增多·····	(281)
四、贸易商品结构变化·····	(291)
第二节 与本阶段对外贸易关系密切的几个重大 问题·····	(312)
一、外汇结算权益的收回及其影响·····	(312)

二、出入超平衡的分析·····	(315)
三、复杂的货币比价与金融投机·····	(325)
四、关税税率的变动及影响·····	(335)
第三节 本阶段内云南社会经济的主要变化·····	(356)
一、推动云南社会旧经济结构解体·····	(356)
二、带动少数民族经济跳跃性发展·····	(365)

第五章 战时统制经济时期的云南对外贸易 (1937 年~1945 年) ····· (379)

第一节 抗战前期的对外贸易概况·····	(380)
一、贸易额大幅度增加·····	(381)
二、国内转口贸易发展迅速·····	(388)
三、有可能视为有利的出超时期·····	(394)
四、进口商品结构的变化及原因·····	(399)
五、实行统制的出口贸易·····	(411)
六、主要外贸运输线及改善运输的努力·····	(424)
第二节 抗战后期的对外贸易状况·····	(434)
一、抗战后期的对外贸易概述·····	(434)
二、打破日寇封锁, 开拓对外交通运输新局面 ·····	(445)

第六章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垄断时期 (1946 年~1949 年) ····· (454)

第一节 本期云南地区对外贸易的状况·····	(455)
一、本期对外贸易概况·····	(455)
二、影响本期云南对外贸易诸因素的分析·····	(467)
第二节 本期对外贸易对云南社会经济的影响·····	(474)
附录·····	(483)
参考文献·····	(512)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云南地区的对外

交往历史基础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毗邻，边界线长达 3270 公里。其中，中缅边界 1997 公里，中老边界 500 公里，中越边界 710 公里。全省在边境线上的县份有 27 个^①，具有与邻国陆地相连的对外交往区位优势 and 源远流长的友好交往历史基础。从文物和文献记录来看，早在秦汉之际，云南地区就已与周边各国建立起较为密切的经济交往关系。因而，要想对这个在现代化经济中举世瞩目的中华经济圈与东南亚经济圈连接部的意义有真正深刻和确切的理解，并对它作出合理的战略评估，使它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就首先要对这条纽带的渊源有所了解。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种古代的经济交往并不等同于近代的对外贸易。但是，由于这些情况是云南地区近代对外贸易的历史基础，因而，在正式揭开云南地区近代对外贸易的篇章前，有必要先对这些脉络略作一点追溯回顾。

一、充当古代朝贡通道的云南地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古代时期，中国与不同国家之间的朝贡关系，虽带有明显和浓厚的政治色彩，但这种交往在一定的意义上，也不失为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物物交换。只不过由于当时自居于“中央王朝”地位的中国封建统治者往往“薄来而厚往”，并不计较等价，因而人们常常会忽略了这种行为具有的交换本性。当然，这种形式的交换不会很频繁，而且必然地局限于以满足统治者需要的奢侈品为主要内容。但是，由此建立的交往纽带以及道路的开通等意义，却是不可忽略的。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多种多样需求的交换活动，也必然要逐渐展开。这不仅在同一地区、同一国家内部是这样，在不同地区即使是不同国家的沿边地区也是这样。而且交换品种也在发生变化，涉及人民日常生活的用品，日益取代统治阶层间奢侈消费品的互换而占据交换的主体位置。特别是当物物交换发展到向钱物交换过渡时，更表示上述交换已具有向一般性交易活动迈进的条件。所谓具有近代意义的不同国家之间的对外贸易，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古代，云南与周边国家经济交往的最初和最普遍的形式，便是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上述交往关系发展过程的总格局中，建立在亲缘地理、亲缘族情基础上的亲缘经济关系。

云南与祖国西南的周边国家山水相连，高黎贡山循怒江西岸南下，内孕腾冲、龙陵和德宏地区，外沿伸展至缅甸东部。碧罗山（怒山）自北而南至保山道人山后，渐自低扩，向南延伸至缅泰境内。高山峻岭之中，孕育着的江川河流，也沿山脉走势由云南流入周边国家汇入大海。如发源于云南

境内的红河，是越南境内富良江的上源；流经柬埔寨、越南南部，与缅甸、老挝交界的湄公河，其上源是发源于青海，经西藏入云南而南下的澜沧江；发源于西藏的怒江，南入云南贡山县流至滇缅、缅泰交界处又称为萨尔温江；由众水汇合的缅甸伊洛瓦底江，其上游又有由云南境内汇入的恩梅开江、大盈江、槟榔河、盏达河、龙川江和南宛河诸多水系。这种特殊的地理特征，形成云南与周边国家山水相依的亲缘地理态势，并自然构成一个地理区域整体，即九大江河流域的两岸人民共同赖以生存、发展的摇篮。生息在这里的各个民族共同以之为相互流动迁徙、融合、消长和繁衍的交汇地，以及北上南下的共同天然走廊。

这个由亲缘地理构成的广大境域内，居住着众多的民族。在中越边境有傣、克木、苗、瑶、哈尼、拉祜、仂佬等族。在中缅边境有傣、景颇（克钦）、阿昌、傈僳、佤等族。这些民族大多跨境而居，有的在不同的国家内仍保持着相同的称谓，如分布在云南、缅甸、泰国、老挝的苗族，都称为苗族；有的则称谓相异，如傣族，居住在云南的叫傣族，居住在越南、泰国的叫泰族，居住在缅甸的叫掸族，居住在老挝的叫佬族或寮族。这些称谓相异的同源民族，语言近同，生活、服饰和风俗习惯大同小异。

这种同源民族分属不同国度格局的由来，有其比较复杂的原因。不过，总的说来，除了历史上疆域变更的影响外，大多是各民族互相迁徙，又相互结合的结果。例如，据历史考据，在今天的东南亚地区，自远古以来，就有泰族的先民居住的遗迹。公元1、2世纪时他们已形成部落组织，其大部落——掸国已出现，并从日南郡和永昌郡到中国通好。到

8世纪时，泰族分成了暹、傣泐、掸、傣那四个部分四个区域。其中的傣那和傣泐族居民继续向永昌、开南地区迁徙，又出现了新的结合。13世纪元在云南设立行省，在泰族区域置车里、八百、老挝、麓川、孟养、木邦等六个宣慰司，孟定和孟艮设御夷府。在缅族地区设缅甸、底兀刺二宣慰司。在蒙族区设古刺，底马撒二宣慰司。其后，迭经缅甸、暹罗、越南的一系列历史活动，到进入近代时，景迈归暹罗，老挝属越南，孟艮入缅甸，云南保有车里。以上所述是以泰族为例的历史情况，其他民族也大多有过类似经历。

由于这种民族交融的演化史程，使云南与周边地区、周边民族、周边国家的经济交往，具有一种近于“血缘”的族情亲缘关系，并成为历史悠久的长期互补互利，荣枯相依的渊源。由此构筑起来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正是近代云南地区开展对外贸易的深厚历史基础。

在上述民族不断迁徙，互相结合的史程中，周边国家曾在很长时期内处于王朝不断更迭，政区经常变化的状态下。越南是到公元939年才立国，缅甸是到公元1044年才形成统一国家，老挝则更迟至公元1353年才建成独立的国家。由于国力较为单薄，所以，在悠长的前述古代时期中，它们便常有派遣使节，途经云南入中原，向中国各封建王朝求封和朝贡的事。如汉代时掸族部落曾派使臣随哀牢携带土特产由永昌道入贡，得汉封赏，后一次还曾献乐，并带有能吐火、自支解和易牛马头的魔术团演出。唐代时也通过南诏与中原内地联系，如唐德宗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骠国王雍羌派王太子舒难陀，率领一个有乐工35人，乐器22种的歌舞团出访中国，在唐都长安受到热烈赞颂。白居易为此

写了《骠国乐》的长诗，描绘了这次演出的盛况。以后，骠国又在 806 年和 862 年两次遣使和唐进行贸易，除了以物易物外，还把骠国银钱带到了内地。9 世纪中叶，骠国灭亡后，蒲甘王朝的开国元勋阿奴律陀曾由八莫入云南求佛牙，受到大理国王的友好接待，赠以碧玉佛。明、清两朝据实录记载，朝贡往来甚密。朝贡往来过程中，充当桥梁作用的云南地区与缅甸也自然建立了纽带关系。至于安南除可另走广西的陆路通道外，还可以由海道进行朝贡且更为便利。所以，其古代途经云南交往的史料较少。

地处内陆的老挝，与中国的官方使节往来，只有通过云南进行。因而其记录要比緬、越为多。这种往来开始甚早，有的史学家甚至远推到起自公元前的越裳朝贡或公元 3 世纪初的堂明朝贡。不过，由于路途的艰辛，这种官方使节的往来到唐代时才较多地正式见于记载。当时的文掸国曾多次带来大象等贡物到唐王朝朝贡。宋元两代的交往记载虽较少，但在有明一代，澜沧国王又先后向中国遣使 30 余次。永乐二年（公元 1404 年）四月，明朝在老挝正式设立军民宣慰司，以刀线歹为宣慰使，颁给印信^②。明末老挝被缅甸东吁王朝侵占，其后又形成几个小国分裂割据局面。直到雍正年间，老挝国内局势才基本稳定，与中国官方的交往重趋频繁。雍正七年（公元 1729 年），南掌王岛孙派出以叭猛花为首的大型使团，带了两头大象，由云南进入北京朝贡。以后又有多次朝贡，在加强同中国政治联系的同时，经济方面也得到清王朝大量的回赠物^③。英国历史学家霍尔教授曾针对当时这种回赠物品的价值远远超过进贡物品价值的朝贡交往关系，指出其在经济上的意义是：“中国把东南亚使团送来

的礼品记载为贡品，东南亚则认为这些礼物的意义主要是在经济上，而不是在政治上。在早期，这是他们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唯一途径。而中国船只则很少远航南洋，正当的贸易只有通过进贡的使团来进行。此外，当中国送回一些礼物作为对他们的进贡的一种答谢时，这些礼物便成为南洋各国获取巨额利润的一种来源，因为其价值往往超过其贡品。必须提到的是，当时东南亚各国的统治者，就是该国最大的商人。”^④对云南地区来说，则还有商道的拓展和睦邻的意义。

古代与周边国家经济交往的朝贡这种形式，对云南地区来说，其经济意义显然是无法和后世的近代贸易相比拟和直接联系的。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考察在古代已与朝贡形式同时存在，并在古代已占据着云南地区对外交往主要地位的民间经济交往。具体地说，即对“南丝绸之路”的形成和拓展的意义作一些必要的说明。

二、“南丝绸之路”和古代的民间交往

“南丝绸之路”的形成，经历过长期的史程。

东南亚地区与各方的联系，是在黄河流域、金沙江流域、恒河流域的各族先民向那里迁移扩散中建立的。有的学者已由人种渊源上作出考证说：缅甸最早出现的北马族、阿尔干族、孟族等与蒙古族有亲缘关系，而达赖族则含有印度血统^⑤。有的学者又由文献记录中寻获证据，指出：在公元前322年建立的印度孔雀王朝的两部重要著作——《政事论》（也称《实利论》）和《摩奴法典》中，都已有“支那”“丝”的记载。据我国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对《政事论》中“侨屠耶”和“支那帕塔”这两个联在一起的词的含意的解

释是：前一个词指的是一种与丝有关的东西，后一个词的意思，为“支那成捆的丝”。“支那”是“秦”的音译。但也有学者认为梵语 Chin 是 Tsen 或 Sinae 的转音，似应译为滇。^④“Chin”既是南亚、西亚和西方人最早对中国的称呼，在这里又和丝紧密联系。因而，有必要考察一下中国古代的丝路，是不是秦朝时已有的通路。众所周知，在秦统一六国之前，是春秋战国时期，北方群雄争霸，烽火连年。当时南方的蜀（今成都）远离战火，且以产丝和拥有较高的丝织技术而闻名。由此推论，《政事论》中所述及的“支那成捆的丝”，说它是从蜀地经云南输往缅甸转贩到印度去的可能，显然要比说它可能是由北方去的合理得多，则外人最早时把丝的来源地称“Tsen”或“Sinae”本是指滇的，后来因转为“Chin”（秦）反而使史学家津津乐道于北路，甚至忘了南路，就不足为怪了。

著名的世界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其 1978 年发表的著作中，也对此指出过：公元前 3 世纪时，大夏（今阿富汗）就已经存在着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同印度、伊朗、地中海和红海的商业城市都有着密切的商业往来。经缅甸转贩到印度的蜀丝，很可能由此又辗转贩运到罗马。众所周知，历史上留有公元前 5 世纪凯撒大帝曾身着丝绸盛装出现在王公贵族面前，引起朝野震动的记载。这也是由“南方古丝绸之路”延伸到欧洲的一项佐证。

上述历史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以成都为起点，经由云南、缅甸、印度、阿富汗而达欧洲的“南丝绸之路”，早在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已经在民间悄然存在。张骞不过是正式发现了这条通道而已。

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从大夏（今阿富汗）归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①这种情况使张骞倍感惊奇和欣喜，他断定在汉之西南存在一条中国外通他国的道路。返回后他向汉武帝“盛言”大夏仰慕中国，很愿意与中国交往，但却慑于匈奴的势力，道（北方丝路）阻不通。他认为汉之西南似有一条外通之路，如果能由此道出，则“道便近，有利无害。”^②他的话说动了汉武帝，“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犛、出苴、出徙邛、出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苴，南方闭僰、昆明。”^③此外，还另派“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④但是，使臣到了滇国，被滇王滞留。此后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汉武帝先后又派出十余批使团，“皆闭昆明（今洱海地区），莫能通身毒国。”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遣将军郭昌、卫广率“三辅罪人”“巴蜀士卒”数万人“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但大兵撤走后，“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通”，再派去的使团，仍被昆明族所阻，“为所杀，夺币财，终莫能通至大夏焉”。4年之后，滇王附汉，武帝赐滇王王印，汉中央在滇池、洱海地区设益州郡，领24县。怒江以东，今保山、大理一带置不韦、嵩唐、比苏、牂榆等县。^⑤又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两汉之际益州地区爆发了栋蚕等领导的大规模民众起义。起义夷众杀郡守、杀长吏，王莽、刘秀都曾派兵镇压。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刘秀遣武威将军刘尚率兵渡泸水（金沙江），入益州。二十一年初，刘尚军追至不韦（今保山市），

“斩栋蚕帅，凡首虏七千余人，得生口五千八百人，马三千匹，牛羊三万余头，诸夷悉平。”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怒江以西、哀牢山以南的哀牢夷内附，东汉中央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属的不韦、嵩唐、比苏、牂榆、邪龙、云南等6县，合并设置永昌郡。以蜀郡郑纯为永昌太守，管理这一区域的行政事务。至此，“蜀身毒道”打通，并由一条民间商旅往来的道路成为官道，为封建国家和中原人民所知晓。四川所产黄丝、丝绸品由此源源不断地运往缅甸，转运印度及当时的西亚等地。而这些地方出产的琉璃珠、沉香、珠宝等商品，也由此道大量进入到大理、滇池、四川。一些外国商人也由此进入云南境内居住和经商。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汉明帝十二年（公元69年），永昌郡便住有“闽濮、鸠僚、僰越、裸濮、身毒之民”，并在那里经商。

缅甸学者貌丁昂在其所著《缅甸史》中对上述情况也有相同的论述。他指出，“早在公元前128年，就有了一条通过缅甸北部的陆路。中国的货物就是沿着这条道路经过印度运往西方的。中国皇帝力图控制途经这条道路的中西贸易。公元97年和公元120年，罗马帝国使者两次沿着这条道路前往中国。”^②

具体说来，这条南丝绸之路的途径，是由四川成都出发，经灵关道（因必须经清溪关，故又称清溪道）、五尺道（因经过古僰人居住的地区，又称僰道），进入云南统归永昌道（因要翻越博南山，又称博南道），由德宏入缅甸，再转天竺道入印度。其中的灵关道是由蜀（今成都）出发，经临邛（今邛崃）、严关（今雅安）过大渡河、清溪峡、笮（今